

諸葛亮史事考辨

——以《三國志》和《魏略》為中心

王懷成

陳壽，生於蜀漢章武三年（233），劉備駕崩白帝城，後主時任東觀秘書郎。蜀漢景耀六年（263），為征西將軍，一路南下，攻取廣漢，後主劉禪請降，蜀國滅亡。魏咸熙二年（265），曹奂禪位給司馬炎，為晉武帝。晉統一北方後，陳壽任著作郎，兼領巴西郡中正，曾出補平陽侯相，官至治書侍御史，元康七年（297）死於洛陽。《三國志》記載的歷史止於咸寧六年（280）西晉滅吳。

魚豢，生卒年不詳，三國時為曹魏郎中，生活在魏晉之交。據《三國志·魏書四·三少帝紀》注引《魏略》記有嘉平六年（254）農曆九月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后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，則知《魏略》記事止於三少帝時。

《魏略》早於《三國志》，也可以說，魚豢的《魏略》是當代史，陳壽的《三國志》則是前代史。二者都覆蓋了魏與蜀交戰的主要時段的史實。以諸葛亮為例，二者記載同一事件時，往往顯示出截然相反的評價標準。

一 諸葛亮形象的對立

第一，躬耕隴畝。陳壽描繪諸葛亮的外表時有一段膾炙人口的文字：“亮躬耕隴畝，好為梁父吟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于管仲、樂毅，時人莫之許也。惟博陵崔州平，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，謂為信然。”^①從其身材、愛好、志向等方面，簡略勾畫出此人不凡的才華和氣度，又通過旁人崔州平（崔鈞）、徐元直（徐庶）等人的交往和側評，顯示出陳壽對諸葛亮人品和才略的肯定。

而對於徐庶等與諸葛亮交往的故事，魚豢《魏略》記載更詳：“亮在荊州，以建安初與穎川石（韜）廣元、徐元直、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，三人務於精熟，而亮獨觀其大略。每晨夜從容，常抱膝長嘯，而謂三人曰：‘卿三人仕進，可至刺史、郡守也。’三人問其所至，亮但笑而不言。後公威思鄉里，欲北歸，亮謂之曰：‘中

^①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五《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11頁。

國饒士大夫，遨遊何必故鄉邪！”^①魚豢與陳壽所載諸葛亮事迹，基本史實較為接近，可以判斷是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。然魚豢所敘“三人務於精熟，而亮獨觀其大略”之語，與司馬遷《史記》載項羽之學相類，不無暗示志大才疏之意。又所謂“仕進可至刺史、郡守”“中國饒士大夫，遨遊何必故鄉”云云，則顯為諸葛亮凡人世俗甚至有些庸俗的一面，此暗示魚豢對諸葛亮的不以為然。

《魏略》記載徐庶之主要事迹時，突出其少好任俠擊劍，闖禍殺人，後折節學問，不為人重的一面，也講述其終能聽習經業，義理精熟，結交石韜、諸葛亮等，成就功名之由。然述及荊州內附，孔明與劉備相隨去：“福（徐庶）與韜（石廣元）俱來北。至黃初中，韜仕歷郡守、典農校尉，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。逮大和中，諸葛亮出隴右，聞元直、廣元仕財如此。歎曰：‘魏殊多士邪？何彼二人不用見乎？’庶後數年兵卒，有碑在彭城，今猶存焉。”^②魚豢所記，絕口不提徐庶歸曹之原因，未又以諸葛亮之歎，來暗示徐庶之才在諸葛亮眼中為高，在曹操眼中則不過能堪右中郎將御史中丞之職而已。“仕、財如此”，顯然是再次暗示諸葛亮的俗氣，認為他在乎的是升官發財，與前文一致。故裴松之注云：

《魏略》此言，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，若謂兼為己言，可謂未達其心矣。老氏稱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凡在賢達之流，固必兼而有焉。以諸葛亮之鑒識，豈不能自審其分乎？夫其高吟俟時，情見乎言，志氣所存，既已定於其始矣。若使游步中華，騁其龍光，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！委質魏氏，展其器能，誠非陳（群）長文、司馬（懿）仲達所能頡頏，而況於餘哉！苟不患功業不就，道之不行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，蓋以權御已移，漢祚將傾，方將翊贊宗傑，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。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！此相如所謂“鯤鵬已翔於遼廓，而羅者猶視於藪澤”者矣。公威名建，在魏亦貴達。^③

顯然，從魚豢對諸葛亮與石韜等三人大談人生理想的記載中，可見他們四人中，另三人對遊學頗為精熟，唯諸葛亮心不在焉，僅夢想著和算計著做官。而裴松之對此大為不滿，認為魚豢所記，未達其心，諸葛亮的志向是“鯤鵬已翔於遼廓”，而魚豢等人的眼光還在藪澤。這明確表達了裴松之對諸葛亮的極高評價，以及對魚豢這樣的史家的批評。

第二，三顧茅廬。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，流傳已千百年，歷來演義家也對此

①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五《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11-912頁。

②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五《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14頁。

③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五《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12頁。

津津樂道，不吝筆墨。此事的源頭更爲直接地取材於陳壽《三國志》。《三國志》云：“時先主屯新野，徐庶見先主，先主器之，謂先主曰：‘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’先主曰：‘君與俱來。’庶曰：‘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，將軍宜枉駕顧之。’由是先主遂詣亮，凡三往，乃見。”^①明確記載了徐庶舉薦諸葛亮，劉備採納徐庶建議，三訪諸葛亮之事，此爲令中國古往今來的士人神往的君臣之遇的最高境界。陳壽還接敘諸葛高談闊論，爲劉備獻計，指三國鼎立之方向，定“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”之目標的高尚高才的形象。

同爲劉備初識諸葛亮，魚豢的記載卻大相徑庭。《魏略》云：

劉備屯于樊城。是時曹公方定河北，亮知荊州次當受敵，而劉表性緩，不曉軍事。亮乃北行見備，備與亮非舊，又以其年少，以諸生意待之。坐集既畢，衆賓皆去，而亮獨留，備亦不問其所欲言。備性好結髦，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，備因手自結之。亮乃進曰：“明將軍當復有遠志，但結髦而已邪！”備知亮非常人也，乃投髦而答曰：“是何言歟？我聊以忘憂耳。”亮遂言曰：“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？”備曰：“不及。”亮又曰：“將軍自度何如也？”備曰：“亦不如。”曰：“今皆不及，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，以此待敵，得無非計乎！”備曰：“我亦愁之，當若之何？”亮曰：“今荊州非少人也，而著籍者寡，平居發調，則人心不悅：可語鎮南，令國中凡有遊戶，皆使自實，因錄以益衆可也。”備從其計，故衆遂強。備由此知亮有英略，乃以上客禮之。^②

魚豢所載，不僅並無劉備主動訪賢的意思，反而稱諸葛亮見劉備形勢嚴峻，故意繞彎子，尋找機會，主動巴結。陳壽所記之主體，在於諸葛亮《隆中對》的高明獻策。而魚豢所記，乃在於因了徵兵之數不足，而出以擴軍之小計。又敘劉備識人不明，幾乎類於馮諼之對孟嘗君。魚豢所載此事，裴松之謂司馬彪《九州春秋》亦然，可見參之於《魏略》。之後，劉備打草鞋的故事遂亦被演義家們所敷演。然裴松之對魚豢所記甚感疑惑：“亮表云‘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’，則非亮先詣備，明矣。雖聞見異辭，各生彼此，然乖背至是，亦良為可怪。”^③裴松之據諸葛亮所上表作爲內證，以驗魚豢等史所記爲偽，具有很强的說服力。由之對比陳壽和魚豢之於諸葛亮的態度，一褒一貶，大略分明。其間微妙，亦是難逃裴氏法眼。之後，蜀人常璩撰《華陽國志》，遂采

①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五《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12頁。

②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五《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13頁。

③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五《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14頁。

陳壽之語。

二 諸葛亮爲人處事的對立

第一，關於孟達。《蜀書·法正傳》載曰：“建安初，天下饑荒，(法)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。”^①後又投奔劉備，《蜀書·劉封傳》云：

初，劉璋遣扶風孟達、副法正，各將兵二千人，使迎先主。先主因令達並領兵衆留屯江陵。蜀平後，以達為宜都太守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，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。達將進攻上庸，先主陰恐達難獨任，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，與達會上庸。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，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。先主加耽征北將軍，領上庸太守、員鄉侯如故，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、西城太守，遷封為副軍將軍。自關羽圍樊城、襄陽，連呼封、達，令發兵自助。封、達辭以山郡初附，未可動搖，不承羽命。會羽覆敗，先主恨之。又封與達忿爭不和，封尋奪達鼓吹，達既懼罪，又忿恚封，遂發表辭先主，率所領降魏。^②

此段記載，將孟達在劉備麾下的功過是非，敘述得較為清晰明確。孟達初因迎接劉備而立功，被劉備任為宜都太守，此時孟達並無怨氣。然建安二十四年之後，劉備對待孟達則頗有不公之處：命孟達攻房陵，孟達勝，將乘勝攻上庸。劉備不僅不賞，反而暗中揣測，不予信任，遂派養子劉封統管孟達軍隊。此舉必令孟達生怨。又上庸攻下，降將申耽、其弟申儀和上司劉封皆得升遷，而達卻全無功勞。此又必然存隙。又關羽求救，封、達二人皆不救，劉備卻“恨之”，也是導致孟達畏懼以致降魏的原因之一。實際上，劉封纔是統帥，孟達為副，發號施令，本無孟達責任，劉備恨之，也可見劉備對孟達不公允。最後，劉封欺辱孟達，奪其鼓吹，劉備未主持公道，孟達難免心中不平。所以，孟達初叛，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，是劉備偏袒劉封、疏遠孟達造成的。

在陳壽筆下，雖大端事迹甚明，然或云“先主陰恐達難獨任”，或云“達既懼罪，義忿恚封，遂發表辭先主”，毋庸諱言，有為劉備曲護之處。在《魏書·劉曄傳》裏，陳壽也有類似的曲筆：“延康元年，蜀將孟達率衆降。達有容儀才觀，文帝甚器愛之，使達為新城太守，加散騎常侍。曄以為‘達有苟得之心，而恃才好術，必不能感恩懷義，新城與吳、蜀接連，若有變態，為國生患。’文帝竟不易，後達終於叛

^①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五《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57頁。

^②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四十《蜀書·劉封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91頁。

敗。”^①一方面，稱孟達有“容儀才觀，文帝甚器愛之”，另一方面又借劉曄之口以證其“苟得之心，而恃才好術，必不能感恩懷義”，叛變之性，溢於言表。故，陳壽確有為劉備回護之處。

劉備對孟達的冷遇和不公，以致孟達叛變，看似與諸葛亮無關，其實不然。魚豢《魏略》中有相關記載：

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，文帝時初即王位，既宿知有達，聞其來，甚悅。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，還曰：“將帥之才也。”或曰：“卿相之器也。”王益欽達，逆與達書曰：“近日有命，未足達旨，何者？昔伊摯背商而歸周，百里去虞而入秦，樂毅感鷓夷以蟬蛻，王遵識逆順以去就，皆審廢興之符，效知成敗之必然，故丹青畫其形容，良史載其功勳。聞卿姿度純茂，器量優絕，當聘能明時，收名傳記。今者翻然濯鱗清流，甚相嘉樂，虛心西望，依依若舊，下筆屬辭，歡心從之。昔虞卿入趙，再見取相；陳平就漢，一觀參乘。孤今於卿，情過於往，故致所禦馬物以昭忠愛。”又曰：“今者海內清定，萬里一統，三垂無邊塵之警，中夏無狗吠之虞，以是弛罔闔禁，與世無疑，保官空虛，初無資任。卿來相就，當明孤意，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，以親駭疏也。若卿欲來相見，且當先安部曲，有所保固，然後徐徐輕騎來東。”達既至譙，進見閒雅，才辨過人，終莫不屬目。又王近出，乘小輦，執達手，撫其背，戲之曰：“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？”遂與同載。又加拜散騎常侍，領新城太守，委以西南之任。時衆臣或以為待之大猥，又不宜委以方任。王聞之曰：“吾保其無他，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。”^②

魚豢對孟達在劉璋、劉備時期的事迹絕口不提，亦是有意回避其作為“背主”之臣的一面。又極渲染孟達儀表、氣質、品德、才能不凡，曹丕慧眼識珠，以示孟達棄暗投明之意。

及孟達再欲降蜀一事，魚豢《魏略》云：

達既為文帝所寵，又與桓階、夏侯尚親善。及文帝崩，時階、尚皆卒。達自以羈旅，久在疆場，心不自安。諸葛亮聞之，陰欲誘達，教書招之，達與相報答。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，密表達與蜀潛通，帝未之信也。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，又勸其入朝，達驚懼，遂反。^③

魚豢筆下的孟達再反，有具體歷史情境。其一，“自以羈旅，久在疆場，心不

①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十四《魏書·諸葛亮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445頁。

②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《魏書·明帝紀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3頁。

③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三《魏書·明帝紀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3頁。

自安”，是曹丕死後，孟達長期作為戍邊之將，無緣進核心的權力圈，漸漸心灰意冷。其二，又“諸葛亮聞之，陰欲誘達，數書招之”，是說諸葛亮掌握到孟達的處境，開始算計孟達，孟達似乎並沒有為之所動，就被小人告密，不得已，正中諸葛亮下懷。孟達最終被司馬懿殺害，實則諸葛亮之反間計使然。從這些資訊中，我們看出魚豢對孟達並沒有明確的批判態度，卻將矛頭指向了諸葛亮，指出諸葛亮睚眦必報、老謀深算。

我們不禁要問，魚豢對諸葛亮的指控是否有道理呢？從陳壽的《三國志》中，可以找到些答案。

孟達先從劉璋，後投劉備，又投曹丕，再投劉備，則孟達其人，諸葛亮早已看在眼裏，心中有數。孟達死於司馬懿之手，可以說是諸葛亮精心安排的借刀殺人之計。《蜀書·費詩傳》云：

（李）鴻曰：“間過孟達許，適見王冲從南來，言往者達之去就，明公切齒，欲誅達妻子，賴先主不聽耳。達曰：‘諸葛亮見顧有本末，終不爾也。’盡不信冲言。委仰明公，無復已已。”亮謂琬、詩曰：“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。”詩進曰：“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，後又背叛先主，反覆之人，何足與書邪！”亮默然不答。亮欲誘達以為外援，竟與達書曰：“往年南征，歲末乃還，適與李鴻會於漢陽，承知消息，慨然永歎。以存足下平素之志，豈徒空託名榮，貴為乖離乎！嗚呼，孟子！斯實劉封侵陵足下，以傷先主待士之義。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，云足下量度吾心，不受冲說。尋表明之言，追平生之好，依依東望，故遣有書。”達得亮書，數相交通，辭欲叛魏。魏遣司馬宣王征之，即斬滅達。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，故不救助也。^①

前文表明，陳壽於諸葛亮為人，是盡力維護的。然在處理孟達反復叛變的問題上，又無法掩飾諸葛亮之機敏善詐的一面。王冲告訴孟達，諸葛亮想要誅殺其妻子，而孟達竟然不信。後諸葛亮以書信引誘，本就要置之於死地。孟達果然動搖，遂引司馬懿追殺，而諸葛亮故意不施救，致使孟達死於非命。

陳壽措辭之間，仍然不忍點破諸葛亮之“陰”，然“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，故不救助也”之語，表明了孟達通款諸葛亮是真，然絕無再投蜀之意亦是真。司馬懿殺孟達，一則清除忠於曹家的勢力，二則確實受到諸葛亮之迷惑，錯殺了自己人，削弱了曹魏的實力。

孟達降魏，的確有其苦衷。《三國志》載諸葛亮書信云：“斯實劉封侵陵足下，以傷先主待士之義。”把劉備的偏袒推脫於劉封之侵陵，則魚豢為孟達鳴冤，亦有

^①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四十一《蜀書·費詩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1016頁。

道理。

陳壽所言，並無揭露諸葛亮之意，然不經意卻也道出了孟達的反叛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。而魚豢對孟達第四次“背主”的理解，是諸葛亮作為主謀，對孟達的不公和陷害所致。

第二，關於劉封。劉封是劉備在荊州時所收義子，素受劉備厚愛，劉封奪孟達鼓吹，激起了孟達的憤怒。對於劉封與孟達在上庸不救關羽，劉備已經記恨在心，祇是孟達做了替罪羊。孟達降魏後反攻劉封，劉封敗退成都，受到劉備的責備。《蜀書·劉封傳》載：“諸葛亮慮封剛猛，易世之後，終難制禦，勸先主因此除之。於是賜封死，使自裁。封歎曰：‘恨不用孟子度之言。’”^①孟達之言：“達僕揆漢中王，慮定於內，疑生於外矣。慮定則心固，疑生則心懼，亂禍之興作，未會不由廢立之間也。”^②孟達告誡劉封，養子的身份，在王位繼承問題上，必然遭懷疑，招來殺身之禍。劉封被殺，正是諸葛亮親手策劃的。劉封因擠占太子之位而被殺的內幕，別人不知，但瞞不過孟達，如果這種內情從孟達之口流出，對劉備和諸葛亮來說是不光彩的。諸葛亮要劉封死，是為了保劉禪繼承皇位的正統性和不可爭辯性。諸葛亮最後修書與孟達通好，可以肯定祇是表面文章，諸葛亮是不會接受孟達重新回歸蜀營的，反而是要孟達速死。孟達出走曹魏，是劉備及劉封不仁義，是蜀國對不住孟達；劉封被殺，孟達恰又知情，是蜀國害怕孟達散布實情。這些事由，都對維護後主的皇權形成潛在的挑戰，故諸葛亮的真實用意已明。

由陳壽和魚豢對諸葛亮和孟達事件的各自敘述可以看到，陳壽為了提高諸葛亮的形象，不惜置孟達之冤屈於不顧，更不願意深究權力鬥爭中的陰暗面；魚豢為了抬高曹魏君主的形象，又極力把諸葛亮描繪成導致孟達謀反和孟達之死的根源。

第三，關於魏延。陳壽《蜀書·魏延傳》載，建興八年，“延每隨亮出，輒欲請兵萬人，與亮異道會於潼關，如韓信故事，亮制而不許。延常謂亮為怯，歎恨己才用之不盡”^③。陳壽言下之意是魏延有勇無謀、多僥倖之，而彰顯諸葛亮之先見之明。至於魏延何以冒進，陳壽略無記載。

而魚豢《魏略》則詳細記載了魏延定計想要奇襲長安的過程：

夏侯楙為安西將軍，鎮長安。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，延曰：“聞夏侯楙少，主壻也，怯而無謀。今假延精兵五千，負糧五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不過十日可到長安。楙聞延奄至，必乘船逃走。長

①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四十《蜀書·劉封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94頁。

②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四十《蜀書·劉封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992頁。

③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四十《蜀書·魏延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1003頁。

安中惟有御史、京兆太守耳，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。比東方相合聚，尚二十許日，而公從斜谷來，必足以達。如此，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。”亮以為此縣危，不如安從坦道，可以平取隴右，十全必克而無虞，故不用延計。^①

魚豢此記，使得世人多以魏延所言自有道理，諸葛亮“以為此縣危，不如安從坦道”，有膽怯無勇之嫌。故胡三省於《資治通鑒·魏紀三》所采《魏略》此段文後辨析云：“由今觀之，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。凡兵之動，知敵之主，知敵之將。亮之不用延計者，知魏主之明略，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。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，況欲乘險僥倖，盡定咸陽以西邪？”^②可見魚豢的確有以諸葛亮為膽怯之輩的嫌疑，此與其對諸葛亮軍事才能不以為然的態度是一致的。

第四，關於諸葛亮死後撤軍。《三國志》記載諸葛亮病危時，使楊儀、費禕、姜維等撤軍，祇令魏延斷後。待諸葛亮卒後，魏延曰：“丞相雖亡，吾自見在。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，吾自當率諸軍擊賊，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？且魏延何人，當為楊儀所部勒，作斷後將乎？”^③則魏延不聽調度，乃欲自為首領，終被部下追殺。此亦站在諸葛亮立場上說話，為諸葛亮神機妙算之有力證據。

然魚豢《魏略》則記諸葛亮死後，雖已對後事安排妥當，然部下素有不和，產生內訌，借機互相攻伐：

諸葛亮病，謂延等云：“我之死後，但謹自守，慎勿復來也。”令延攝行己事，密持喪去。延遂匿之，行至褒口，乃發喪。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，見延攝行軍事，懼為所害，乃張言延欲與眾北附，遂率其眾攻延。延本無此心，不戰軍走，追而殺之。^④

魚豢此記，乃為魏延鳴不平，示諸葛亮後事處理之不當。魏延謀反，變成了被楊儀誣陷所致。此法與前番記孟達事頗類。然孟達之為諸葛亮算計，即使是在陳壽之筆下，也草蛇灰綫，非無中生有。

裴松之對魚豢的記載則大為不滿，注云：“臣松之以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，不得與本傳爭審。”裴松之無可解釋時，以敵國謠言定論，但魚豢所言，亦不可不信。

三 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的對立

①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四十《蜀書·魏延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1003頁。

② [宋]司馬光：《資治通鑒》卷七十一《魏紀三》（明帝太和三年），中華書局1956年版，第2240頁。

③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四十《蜀書·魏延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1003頁。

④ [晉]陳壽：《三國志》卷四十《蜀書·魏延傳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版，第1003頁。